

古代
城鎮

山西古代城鎮研究

李书吉

主编

崔彦华

副主编

三晋学术研究书系

山西出版
三晋

李书吉 主编

崔彦华 副主编

山西古代城镇研究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古代城镇研究 / 李书吉主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457-1328-2

I. ①山… II. ①李… III. ①城镇—研究—山西省
IV. ①K92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375 号

山西古代城镇研究

主 编: 李书吉

责任编辑: 秦艳兰

助理编辑: 余 龙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总编室)

0351-4922203 (印制部)

网 址: <http://www.sjcbs.cn>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1328-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山西在华夏中心形成及都城格局变化中的历史地位述略	001
两周时期的山西古代城市	
——以考古发掘为中心的考察	072
汉代山西北部边郡与汉匈战争	088
北齐陪都晋阳与欧亚大陆经济文化交流	103
北魏城市与农村关系新论	
——一体融合抑或二元对立	116
“洛阳—平城”两都格局与北魏政权之败亡	135
中古时期粟特人移入河东的原因及分布初探	147
从孝明帝“差割强族”看献文孝文北镇民地位的流变	161
晋阳城的三圈防御与中心地位的形成	182
北魏至唐云中地域功能的沿袭与转化	195
唐高祖、唐太宗在蒲并等地的返乡足迹及意义辨析	220
隋唐五代山西蒲州的特殊地位	236
阳城海会寺历史文化价值及旅游价值	249
北宋太原城的划时代关心民瘼功能	260
北宋太原城	314
明初藩王护卫牧羊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322
明清太原县城的水患与应对	
——以风峪沙河为例	334
后记	349

山西在华夏中心形成及都城格局 变化中的历史地位述略

李书吉

摘 要:山西在华夏中心形成、政治格局的变化、都城北移的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平阳是目前所知华夏民族的第一个都城,是华族文明的核心区域;晋国在两河间的崛起,成为东、西二都的主要支撑;韩、赵、魏在中原的拓土筑城,进一步将华夏根基夯实;而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政治格局变化中,游牧民族在山西境内建立的平阳、平城、晋阳三个都城,成为当时多民族凝聚的重要基地;五代时沙陀族四个政权都在晋阳,在中国都城北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辽、金两代两京的大同成为都城北移的最后一个接力棒。

关键词:华夏;都城格局;核心区域;决定性;

一、陶寺遗址及天下之中都城的奠基

(一)五帝统系的确立

上古时期,帝和都是一相对应的概念,都当由帝来。然而,史前帝王本来就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如通常所说的三皇五帝,线索纷乱,头绪多端,殊难确断。吕思勉先

生条缕三皇之说有六,五帝之说有三^①。严文明先生列叙五帝四说^②,所以,要清楚上古都城的构建,必先理清帝王之统系及由来:

遥远的古代,人们将天、地、日、月、星、辰、风、雨、图腾、社稷等等均称之为神灵,是原始的泛神时期。到了夏、商时期,有了关于“天”和“上帝”的概念。殷商先祖把“上帝”奉为众神之上的至上神,这个作为至上神的上帝拥有超越自然和人之上的至高无比的权威。正如丁山先生所言,“帝在商代当是一切大神的共名”^③。

到了周代,作为至上神的“帝”逐渐为“天”所取代,天即“昊天”,文献所载之“昊天上帝”,亦即周人的“昊天”等同于殷代的“上帝”。但无论商代的“上帝”也好,还是周代的“天”也好。他们所主宰的众神无非为三大类,在殷商的三个序列为天神、地祇、人鬼,周代的神祇、天神、人鬼、地师,都在天、地、人之间。周代的祭祀体系尤为复杂,祭拜仪式也非常隆重,诚然在周代全部的祭祀中,祭天仍是最高礼仪,是成为人主的象征,但是祭天又必须以其祖配祭。这样,就必然使先祖和天、帝之间发生密切的联系,在王权势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和在王权支配下的“神道设教”的氛围中,天神的偶像地位发生动摇,神向人倾斜,过去那种上天神灵发生演变,逐渐衍化为圣王贤相。如丁山先生所说,周代的所谓“昊天上帝”,在《诗》《书》里逐渐写成“皇天上帝”,或者略称“皇帝”,而到《左传》《国语》中则直接书其为“黄帝”,又从“昊天”分出“太皞”、“少皞”,又将“昊天”演变为“皓天”,又衍化为“帝皓”或“帝咎”。这样就从“天神”中演出“黄帝、太皞、少皞、帝咎、颛顼五个新神来”。^④

最早提出“五帝”概念的是荀子,《荀子·非相篇》中说:“帝尧长,帝舜短”。又说: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①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20页。

②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卷1,严文明撰《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4页。

③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1月,第602页。

④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1月,第602页。

五帝之说,可谓历史认识上的一个界碑,前已述之。泛神信仰,是人类信仰的初始阶段,而至上神上帝的出现,则树立起一个在众神之上的至高无比的神坛;五个新神的登场正预示着一种人与神信仰的裂变,五帝概念的提出则最终使将对人主的崇拜凌驾于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之上。上述荀子之语有两层涵义,其一,五帝之外无传人,是说五帝之前无传人,为何无传人呢?是因为历史久远的缘故。这就把帝放在历史发展的序列,放到了人治,对人的崇拜序列。与此同时,荀子提出一个圣王至上的认识,在“五帝之外无传人”之前还有一段论述,他说:

“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夫禽兽有父子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辩,辩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其二,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所谓圣王是凭善政,治绩而圣,故而圣王不是永恒的,圣王是在历史的不断进化中产生的。

荀子在《非相篇》中提出了五帝的概念,但五帝为谁?荀子只列出两位即尧、舜。荀子是儒家的第三代传人,他的老师是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学生。尧、舜崇拜的倡导者是荀子的祖师孔子。试举两例,《论语·泰伯》中载:

子曰:“巍巍乎舜、尧之有天下也,而又与焉!”

又说: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

又如同荀子同时代的儒者孟子对尧、舜的称道: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万亲》上)

大舜有大焉,……自耕稼陶洫以至帝,无非取于人者。(《公孙丑》上)

儒家《尧典》一书,正是在《孟子》书中最早提到的,书中在颂尧之功时,也常提到

舜、禹。人说孔墨之徒，言必称尧舜，在《墨子》书中称道圣王尧、舜，亦可谓言不绝口，如《三辩》、《尚贤》、《节葬》、《经下》中多有称颂尧、舜之词，并且往往将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并称。

上述可知，荀子在其书中虽提出五帝之概念，但只叙及尧、舜两帝，孔孟书中大加赞颂的也只有尧、舜两帝。其余三帝并未落实。完整的五帝出现在《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中，《五帝德》载宰予问孔子，问到六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前五位名前都冠之以“帝”，独予禹未称“帝”。可知前五位是典定的五帝，《帝系》记载亦如此。

《大戴礼记》同荀子有何关系呢？这里稍作考辩。据蒋伯潜《诸子通考·荀子略考》称：

荀子一生，大抵四十以前治学，五十左右周游，六十以后为兰陵令，为令不久即致仕而设教著书，与孔子、孟子相类。唯孔、孟均归老故乡，荀子则侨寓兰陵以终耳。^①

荀子为战国后期之大儒，在赵时曾“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在齐“最为老师”，韩非、李斯曾受业于荀子。胡元仪撰《郇卿别传》，并附《郇卿别传考异》，说荀子通《易》《毛诗》《春秋谷梁传》，并且是三经的重要传授者。又云：

卿尤善于礼，今授受源流不可考。然《汉书·儒林传》，东海兰陵孟卿事萧奋，以礼授后苍，苍说礼数万言，号曰：“《曲台记》，授戴德延君，戴圣次君。德号大戴，圣号小戴。据刘向云：“兰陵人，善为学，盖以法孙卿也。”孟卿兰陵人，善为礼，又字卿，必得郇卿之传也。^②

上说，东海兰陵，世传《礼记》，汉时传《礼》影响最大者是后苍，后苍著《曲台记》，由传授《曲台记》始将《礼记》分为大戴礼、小戴礼。后苍之师为孟卿，孟卿既为兰陵

① 蒋伯潜：《诸子通考·荀子略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第171页。

②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载《诸子集成》二，中华书局，1986年5月，第36—37页。

人,又字卿,兰陵人喜字卿,是仿孙卿(荀卿)而来,又孙卿善礼,故兰陵人孟卿之礼,必受孙卿之传。

又汪中《荀卿子通论》称:

二《戴礼》并传自孟卿,《大戴礼·曾子立事》篇载《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篇载《礼论》《乐论》篇文。由是言之,曲台之《礼》,荀卿之支与余裔也。^①

上说《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中转引了《荀子》书中《大略》《修身》两篇中的部分内容。查《曾子立事篇》,引述《大略》篇文有六处,不见《修身篇》引文,但有《荀子·不苟篇》《君道篇》引文各一处。这些说明,荀子同《大戴礼记》的传承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所述,荀子虽未提出像《五帝德》《帝系》中完整的五帝,但他除提出五帝概念外,提出了圣王至上的认识。另外,在《荀子·哀公问》中还为圣王划定一个标准,他说:

“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

这里说的明白,大道指“应变不穷”,而情性在于“理然不取舍”,具备这两者,方可“总要万物于风雨”,成为圣王。丁山先生提出一个认识,甚切要害。他说:

我认为尧、舜之人格化,自孔子发其端;黄帝、颛顼、帝喾之人格化,自荀子集其成。而将古代训语所传说的上帝神话完全演为人文的历史以开秦汉以后正统史观托始黄帝,大儒荀卿“五帝以外无传人”一句话要负全责。有了他这句话,以往“上帝创造人文的神话”,都变成了古圣先王创造人文的历史了。^②

^①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载《诸子集成》二,中华书局,1986年5月,第14—15页。

^②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1月,第473页。

《五帝德》《帝系》确定的五帝,在《吕氏春秋》中得到认可。《吕氏春秋·尊师》提出五帝及各自的老师,皇帝师大挠,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州友父,帝舜师许由。《吕氏春秋·古乐》又叙五帝各自创造和使用的音律。《吕氏春秋》除叙之五帝外又在十二世界列出一个五帝和五神系列来。帝太皞,神句芒;炎帝,神祝融;黄帝,神后土;帝少皞,神蓐收;帝颛顼,神玄冥。五帝配五神。然此神的地位,显然低于帝。如太皞配句芒,句芒是少皞之裔子;炎帝配祝融,祝融为颛顼之后;黄帝配后土,黄帝与后土则非亲族关系;少皞配蓐收,蓐收为少皞氏裔子;颛顼配玄冥,玄冥为少皞氏之子。并且这些配神均为帝管理具体事务的助手,所以,虽列五神,并未撼动帝之地位。

这样,在《吕氏春秋》中出现了关于五帝的两个系统,《尊师》《古乐》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十二纪》所列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帝。两系统均入选者仅有黄帝、颛顼。关于这两个系统,顾颉刚认为:第一个系统所支配的时代,从战国末起,至西汉末止,约得二百五十年,第二个系统所支配的时代,从西汉末到现在止,凡一千九百余年。^①

第二个系统缘何能从西汉支配到现在呢?这个问题顾颉刚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然就历史记载的帝王正统统系而言,第一系统所支配的时代应从战国到现在,始终没有变,这是不争的事实。

《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所核定的五帝正是《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所确定的五帝统系,即皇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本纪》将禹列入《夏本纪》,不在五帝之列,这也同《五帝德》《帝系》不称禹为帝是一致的。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后,特作了一段提示,强调性的说明: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①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49页。

上述,重点说明三点:一、《尚书》只载尧以来事迹,儒家亦不传五帝事,唯百家之书论述黄帝,又非典雅之训,而《五帝德》《帝系姓》所载五帝是可信赖的史实;二、为此,司马迁亲自做过考察,西至宁夏,东至海,北至河北,南至江淮,访问过的各地长老都在传述黄帝、尧、舜的居处、故事,虽各地风俗迥异,但所说与古书记载大致不差;三、以《春秋》《国语》等书验证,更觉得《五帝德》《帝系姓》所载五帝,是一个值得彰显的大发现,唯其重要,所以把它放在《本纪》之首。

(二)尧帝陶寺都城

五帝既已落实,那么都城的事也就有了头绪。文献记载上古帝王制作,居处等最为详备的首推《世本》。《世本》一书至宋已失传,于此顾颉刚先生作为考证,关于该书的作者,颜之推曾有引述。他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称,《世本》出自左丘明;也有说该书为楚汉之际“好事者”之集录;《隋书·经籍志》说“汉初得《世本》。”顾颉刚先生同意将其确定为汉初著作,它可与《五帝德》《帝系》等“比类而观。”

据考《世本》有《世家》《传》《谱》《氏姓篇》《居篇》《作篇》等体例、内容。其中《作篇》叙帝王等制作,有燧人出火,句芒作罗,神农作琴,祝融作市,黄帝造火食,伯余作衣裳,夷作鼓,颡项命飞龙造洪钟,尧使禹作宫室,化益作井,鲧作城廓,皋陶作五刑等64篇;《居篇》共四篇,黄帝都涿鹿,涿鹿在彭城南;老水,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舜居妫汭,在汉中的西城县;夏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顾颉刚先生说:

《世本》不是一部造伪的书;乃是一部整理伪书的书,为伪书做宣传的书,使伪书成为史实的书。(如夏都安邑,是现在人公认的史实,但他们的根据只在这部书上,这可见它的宣传功效。)^①

伪史大都是伪时代,伪作者,而所载史事并非全在造假。正如顾先生所言,夏都安邑,本是事实,大家都知道,但人们作论只说依据的是这部书,这也说明此书于此所载不假,人们之所以乐于以它为据,大概也因为他所载可信度高,并非完全是宣传的效果。

^①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107—112页。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的活动范围称：

东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上述黄帝活动范围很大，然迁来无常处，邑于涿鹿山下，这样看来黄帝并无都城。

《五帝本纪》又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史记·集解》引《山海经》称：“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关于这两地史念海先生考证指出：“实际所在，仍难确指。”^①这样看《世本》所说“黄帝都涿鹿”，此语不确。涿鹿之地同黄帝确有关系，但非都城，是黄帝邑居之地。轩辕之地有没有？在何处？难以考实，此地即使存在，也只是黄帝的邑居之处。

黄帝之后是颛顼，颛顼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据《集解》引皇甫谧语云：“都帝丘，今东郡濮阳也。”然其地作为都城未见考古发掘之实证。

帝喾是黄帝的曾孙，《集解》亦引晋人皇甫谧的话称：“都亳，今河南偃师。”考古工作者二十世纪在此地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遗址，但经考察研究是属于二里岗时期的文化遗址，同帝喾所处的时代无法联系起来。

关于尧、舜时代确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和尧之人物，备受史家和儒者称道。正如上引司马迁《五帝本纪》所云：《尚书》所载自尧始。又孟子发现上古时之《尧典》，人常说：“孔墨之徒，言必称尧舜。上引《世本·作篇》记载帝王制造之六十四事，而于构建城廓、宫室者只提到两个人：一是鲧作城廓，一是尧作宫室。鲧是尧的臣属，《五帝本纪》云：

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这里说尧曾用鲧治水，功不成，水害不息。未提到作城廓之事。那么，尧提出治

^① 史念海：《史念海全集》卷1，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第536页。

水,众皆推荐鲧,是否在此前有过作城廓之事,史无所载,然在治水失败之后,《正义》云“故放退也”,不会再有任用之事。退一步讲,鲧确作城廓,也是尧时代之事,是尧之功。

尧修宫室,没有明确记载,尧都平阳则既为《世本·居篇》所载,也是为众史家确认的。《五帝本纪》称尧曾置春、夏、秋、冬四季之宫,设四方邑居。云:

乃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以殷中春……申命羲叔,居南交……以正中夏……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以正中秋……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以正中冬。

关于幽都,《集解》孔安国曰:“北称幽都,谓所聚也。”《正义》案:“北方幽州,阴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两解都说为邑聚,既然四季之官均有邑聚,那么,尧之居处地,当应为都城了。

史载尧居唐国,或曰陶唐,那么陶唐地又在何处?《集解》引《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其下又引之书,一、《帝王世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三、引《括地志》:“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上引之书,两书均将尧都直接指向平阳,而徐才所说的唐国则是指尧后裔的封国,即尧以后的唐国范围,此姑且不论。由上可知尧时的平阳和陶唐地应为一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前聚落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为城市或都城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尧之都城提供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关于史前由聚落到都城的演进,严文明先生有一重要论断,他说: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数量稀少的很小而又不甚稳定的聚落演进到中期较大的而又相对稳定的聚落;从中期凝聚式和向心式聚落演进到晚期的凝聚式和内部有区别的内向式聚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个别中心聚落的出现到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一大批中心聚落和城址的涌现,再进一步某些级别较高的城址向都城转变,它是夏商周大型都城级聚落的前奏,从而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产

生奠定了基础。^①

陶寺遗址发掘于1978年至1985年间,发掘总面积450万平方米,“年代跨公元前2600—前2000年间,大体相当于五帝时代后期的尧舜时代及其后裔延续”^②。

目前为止,在临汾盆地已发现陶寺文化遗址八十余处,其中规模最大者即陶寺遗址。从陶寺文化遗址自身的聚落结构看,有大聚落、小聚落;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上级聚落与下级聚落各种形态,而在这些聚落形态之间,又存在着两种关系的交叉,“一种是血缘宗族内部亲疏、长幼、主脉与支系的关系;一种是与前者对应的权利与义务、支配与依附的关系。上述三级(或四级)聚落之间,既有文化面貌的一致性,又存在规模和规格上的一致性”^③。

郭大顺先生说:“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形成在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存在着由中心、次中心及其周围星罗棋布的一般聚落构成的网络状分层结构,似乎已形成具有政治、宗教统辖关系的‘都、邑、聚’格局。”^④

在陶寺文化遗址发现的墓地占地有四万平方米。现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在几座特大型墓葬中发掘随葬之鼍鼓、特磬、蟠龙纹陶盘等王室重器。多元文化汇聚也是陶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墓地发现的随葬中,有源于内蒙古河曲地区的原始甗鬲;有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彩绘龙纹陶盘;有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双孔玉刀和玉琮;有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礼器。“从陶寺遗址文化可以看到:陶寺遗址中包含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甘青高原广大地域的文化因素,成为集多源于一统的最初华夏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标志着中原最终铸就在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枢地位,为三代古典文明奠定了基础”^⑤。

① 严文明:《中华文明的始源》,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第92页。

② 郭大顺:《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端——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11页。

③ 高炜、张岱海:《汾河湾旁磬与鼓》,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662页。

④ 郭大顺:《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端——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11页。

⑤ 高炜、张岱海:《汾河湾旁磬与鼓》,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666页。

关于这一次文化汇聚的途径、走向,苏秉琦先生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他说:

距今 7000—5000 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这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地区古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文化因素在距今 5000—4000 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在此结合,这就是陶寺。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这就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①

(三)天下之中的奠基

如果说仰韶时代是一个满天星斗,百花绽放的时代,那么,龙山时代就是一个多元汇聚,文化辐辏的时代。由仰韶时代进入龙山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换句话说何谓龙山时代呢?严文明先生提出四点:1.由农业,手工业发展带来的石器、陶器的专业化生产;2.由贫富分化日益明显而出现的贵族墓葬及数量多、质地较好的随葬品;3.出现了少数面积甚大、规模颇高的中心聚落;4.随葬武器成为时尚。^②

苏秉琦先生又从陶器、墓葬、礼器等方面的发展于此作了更为细致的描述,他说:

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黑灰陶盛行,袋足器、圈足器发达,朱绘、彩绘黑皮陶代替了彩陶,大型聚落遗址(古城)出现,墓葬类型分化,大墓中使用双层或多层棺槨以及由玉器、漆器、彩绘陶器、蛋壳陶器组成的等等,反映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的更大范围的组合与重组,这就是“龙山时代”出现的文化背景。^③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35—136页。

② 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640—641页。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37页。

考古学界不仅把龙山文化作为五帝时代的背景,并且进一步提出了龙山时代前后期和五帝时代前后期的认识。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上可以把龙山时代划为前后两期。根据古史传说也可以把五帝时期划分为两期,前期以黄帝为代表,后期以尧、舜为代表。”^①

郭大顺先生有大致相同的意见,他说:“五帝前期红山文化由北南下,与仰韶文化接触,促成对历史全局的影响,是由吸收到碰撞的形成;五帝后期在陶寺文化表现出的由四方向中原汇聚则是以文化的融合为主的。”^②

按照苏秉琦先生关于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的论证,郭大顺先生认为,五帝前期的黄帝集团和后期的尧舜都进入了古国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北方集团,率先跨进古国阶段,而尧舜是在‘中原建立的古国’^③。而高炜、张岱海两位先生则提出:“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④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与炎帝战于阪泉,与蚩尤战于涿鹿,一生处于四方争战之中。另一方面又说黄帝“治五气、树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擒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是一位勤勉、亲民、发明、创造、广布仁德的好帝王。然而,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又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还没有一个协和万邦,凝聚式,向心力的邑聚或都城,这应当是划分五帝前后期的一个标尺,也即黄帝及颛顼、帝喾同尧舜时代的分水岭。

《五帝本纪》载(帝尧):

① 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640—641页。

② 郭大顺:《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31页。

③ 郭大顺:《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31页。

④ 高炜、张岱海:《汾河湾旁磐与鼓》,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668—669页。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尧典》说他“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又设四岳，纳百揆，齐士政，象典型，放驩兜，窜三苗等。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更称：“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俨然是一幅威服四方，万国朝会，尊崇无比的帝王形象。

文献记载中首次将尧之都城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源于《孟子》，《孟子·万章章句上》载孟子言云：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史记集解》引刘熙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战国策·楚一》载：“陈轸，夏人也，习之三晋之事。”鲍注：“夏，中国也。”

中国，或称中夏，指的是夏族或华族的聚居地。所谓华族，按苏秉琦先生说，起源于仰韶文化，而仰韶文化相当于传说时代的“神农氏时代”，神农氏传说是农业的发明者，神农氏时代或说仰韶文化时代是同五帝紧相衔接的。^①尧时华族在陶寺形成中心，我们可以说，陶寺是华夏族群的第一个中心。华夏族的居处，不断向四周延伸，而华夏的中心也在不断的迁移。《孟子·万章章句上》引《史记集解注》称：“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尧治平阳，舜治蒲阪，禹治安邑。”

尧都平阳既成为信史，那么，关于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的记载也应是不差的。史念海先生关于冀州都城的探讨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禹贡》所载，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是以冀州为先的。而当时的冀州即包括今山西省和河南省黄河以北的西部以及河北省的西部地区。《禹贡》其书，成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可归纳为三种，即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刘起釭先生主张《禹贡》一书非出于一人之手，

^① 郭大顺：《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31页。